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战乱时期一片自由而包容的精神园地,教授如云,能够开宗立派的更比比皆是。《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一书却将视线投向了教授夫人:有人在灶台边看狄更斯,有人拎着篮子卖米糕补贴家用,有人写稿成为刊物主编。作者郑绩通过对这一群体的深入挖掘,意外地打开了观察那个特殊时代的另一扇窗,透过厨房的烟火、衣服上的补丁、校园边垄沟间的身影,可以看见一群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如何以近乎悲壮的坚守,完成一场文化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以此为索引,我们得以探索西南联大的方方面面。

从书斋到烽火

战前的北平,对于教授们来说是一个书斋宁静、生活优渥的世界。

1917年落成的清华园甲、乙、丙所,专为校长、副校长、秘书长而设,上任迁入,离任搬出,雅静非常。冯友兰之女宗璞在多年后回忆:“清华园内工字厅西南,有一片小树林……最靠近树林的是乙所,东、北两面都是树林,南面与甲所相邻,西边有一条小溪,溪流往工字厅的荷花池。”1930年起,冯友兰便住在这林溪之间,直至七年后风雨骤来。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战火,全民族抗战自此开始,北平的书桌再也无法安稳放下。清华园沦为日军马厩,北大红楼变成宪兵司令部,天津的南开大学则在轰炸中成为火海。日军指挥官公然宣称:“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学校被炸毁当日下午向报界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彼时北大为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清华是理工重镇,南开则是国人自办最优秀的私立学府。三校沦亡也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已存续边缘。

国民政府教育部急令三校南迁,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以“临时”为名,本是众人以为战事不久即平,一切安排皆作权宜之计。师生们穿越烽火,有的徒步南下,有的沿路乞讨,更有人冒险携出仪器书册。1937年11月1日,临时大学在韭菜园圣经学院正式开课。

岳麓山下,湘水之畔,琅琅书声在危楼窄室中再度响起。教室、器材缺乏,经费仅有战前三分之一,教授工资也打了七折,学校免去大部分学费,并向贫困学生发放微薄补助;图书馆仅藏书六千册,教师凭记忆授课。即便困顿如此,学术的星火也从未熄灭。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新理学》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有人问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岳霖说,“为了让它保留一点中国味”。

随着战局吃紧,南京沦陷,三百余名学生投笔从戎,悲愤北上。随后武汉告急,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走还是留?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激辩在校园蔓延。最终,八百二十名学生踏上西行之路,六百余人或投身战场,或辗转他校,或返回家乡。

在西迁路线之中,有一支“湘黔滇旅行团”的队伍,徒步穿越三省,历时68天,跋涉3500余里抵达昆明,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教授闻一多是步行团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沿途指导学生宣传抗日,采风问俗,并著须明志,不到抗日胜利决不剃须。国家危难时刻,中国读书人的血性与风骨,尽显于此。

1938年,三校于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宿舍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赞扬长沙临时大学迁校“长征”的胜利。

从北平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和众多读书人一样,冯友兰也在颠沛跋涉中尝尽家国之痛,于是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书页之外,她们撑起西南联大的岁月

野蛮的抗争、对文明的守护——无论是讲台上引经据典的教授,还是灯下缝补衣衫的妻子,都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对



●赵萝蕤(右)与陈梦家

茅屋里的辉煌

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如果说教授的学术成就与精神高度是西南联大的A面,那么种种实务之艰难,生存之困苦,正是联大的B面。

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联大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却屡次修改的无奈之作——从高楼到平房,从砖瓦到茅草,最终成为“史上最简陋的大学”。教授们的住所更是令人心酸:华罗庚一家六口挤在牛圈上层的木楼棚,牛在下面吃草,他在上面演算;闻一多全家八口住在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常带着孩子们去小河边洗脸;吴大猷买不起牛肉,就提着篮子去菜市场,捡些牛骨头带回家为病妻熬汤。

而西南联大教授夫妻中也不乏珠联璧合者,能在专业上互相扶持探讨,其中一对便是陈梦家与赵萝蕤。西南联大规定夫妻不能于同一所学校任教,陈梦家去教书,赵萝蕤遂居家做主妇。“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作出牺牲。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1939年后,赵萝蕤在云南大学、云大附中兼课,还给人当钢琴私教。右手锅铲,左手狄更斯的赵萝蕤终究不是一个纯粹的主妇,她“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学书,勤读而不疲。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学书,勤读而不疲。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学书,勤读而不疲。”

初到昆明,住在圆通山,陈梦家去上课,赵萝蕤和刚初二的弟弟赵景伦在家想法子生火做饭。第一次管家,姐弟二人一边用小火炉子烧饭,一边各自读书,结果是一锅焦饭,一锅焦肉。赵萝蕤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那篇《一锅焦饭 一锅焦肉》就由此而来。做饭以外,赵萝蕤还学着开辟菜园,里面品种齐全,黄瓜、刀豆、辣椒、丝瓜、茄子和“亭亭玉立”的番茄,样样都有。除了种菜,她还养鸡,拿菜叶子和米糠喂了一群鸡。养鸡且不足,她又养了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姐,过起苦日子来也有声有色。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如她一般的联大女性,始终在艰难中维系着家庭的温度与精神的独立。

正是这些茅屋草棚之下,孕育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联大八年,培养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一百多位人文大师,一百七十多位两院院士。联大人参与研究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华罗庚完成数论巨著《堆垒素数论》,赵九章写下的《大气之涡旋运动》获1943年度自然科学类二等奖,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仍是学界经典。

在战火纷飞中,西南联大不仅保存了中国的学术火种,更在艰难中孕育出了中国学术的独立。正是这些茅屋草棚之下,孕育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联大八年,培养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一百多位人文大师,一百七十多位两院院士。联大人参与研究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华罗庚完成数论巨著《堆垒素数论》,赵九章写下的《大气之涡旋运动》获1943年度自然科学类二等奖,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仍是学界经典。

精神火种不灭

郑绩在撰书中发现,西南联大的资料日益丰富,但教授夫人资料并不好找。少数人因自身才华留名青史,如封凤子、赵萝蕤、杨绛;或凭借回忆录为人所知,如杨步伟、韩咏华。还有一些人在专业领域上成就斐然,如动物形态学家崔之兰、核物理学家王承书,她们因联大“夫妻不能同校”的旧规而另行谋职,却仍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清晰印记。

绝大部分人只存在于日记、信件、回忆录的边角夹缝,许多甚至连名字都难以找到。文史大家唐兰身后遗有十二本文集,生平资料丰富,而其夫人张晶筠的名字,仅在一张合影注解中得见。郑绩几经周折,通过国家博物馆捐赠名单才确认其名。至于她的生平故事,则几乎一片空白,仅在他的回忆里一笔带过。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一书最为珍贵的,是透过女性的目光,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学术巨匠,还有这些成就背后的沉重代价:地质学家冯景兰的妻子全珺带着幼子艰难转徙时犹不忘丈夫的地质标本;黄钰生妻子梅美德在南迁路上将有营养的食物让给其他人;周先庚的夫人郑芳为补贴家用替人做刺绣、织毛衣。

苦难中亦有温情与幽默。哲学家汤用彤的一切吃穿均由夫人张敬平打点,每天早上吃馒头时,夫人会往里面夹入芝麻粉为他补脑。有一天早上,张敬平错将茶叶末当成芝麻粉夹进了馒头,汤用彤对夫人全盘信任,照吃不误,全部吃完之后方说,今天的芝麻有点涩。

这本书最终拼出一幅完整的精神图景:男性学者在前台书写学术传奇,女性在后台编织生活网络,共同构成了那个黑暗年代里最温暖的光。文明的韧性不仅存在于宏大的论述中,也藏在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里。无论是讲台上引经据典的教授,还是灯下缝补衣衫的妻子,他们都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对野蛮的抗争、对文明的守护。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阅读这些故事,不只是回望一段历史,也是在这些文字中看到一种信仰,无论时代如何艰难,精神的火种始终可以相传。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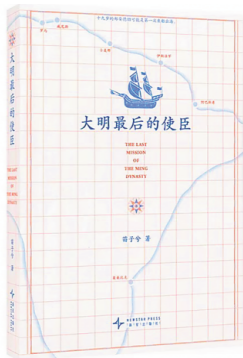
- 1.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文艺出版社
- 2.汪曾祺:《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山东画报出版社
- 3.陈寅恪、冯友兰、朱自清等:《西南联大通讯录》,四川天地出版社
- 4.许渊冲:《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书单

《大明最后的使臣》

苗子兮 著 新星出版社

南明在清军铁蹄的践踏下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南明宫廷策划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外交行动,选派郑安德肋与卜弥格神父将书信送往罗马。年仅十九岁的郑安德肋,怀着憧憬与热血踏上万里征途,穿越战火纷飞的大地与浩瀚无垠的海洋。这不仅是一段南明绝境中的挣扎求生之旅,更是东西方文化与政治交织碰撞的见证。书中细致呈现了这段被历史尘封两百多年的传奇经历,让读者得以深入了解南明在生死边缘的外交博弈,感受两位主人公跨越山海的非凡勇气,领略明清易代时期那一抹独特而悲壮的中西交流色彩。



《照亮黄昏:一名老年病医生的建议》

[英]露西·波洛克 著 彭小华 夏燕飞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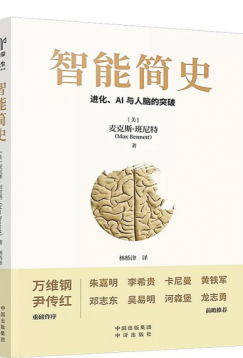
倘若暮年将至,我们应如何面对那些无可回避的衰老真相?当社会逐渐迈入老龄化,我们又何以关爱好每一个个体?当下社会是否应给予老年人生活境况以更多关注?通过多年临床观察,波洛克发现,当老人们逐渐被各种药物和检查填满日程时,其内心对陪伴、尊严和自主生活的渴望却常被忽视。过度医疗正让晚年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治疗循环,而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仍停留在物质保障层面。波洛克认为,比延长生理存在更根本的,是守护人之为人的联结,选择与意义。衰老不是需要修复的故障,而是需要理解的过程。这是一位医者的职业反思,也是对生命终局的温柔凝视。



《智能简史:进化、AI与人脑的突破》

[美]麦克斯·班尼特 著 林桥津 译 中译出版社

AI如今能模仿莎士比亚的文风作诗,能自动驾驶汽车,甚至通过司法考试。然而,人类大脑轻而易举完成的认知壮举,AI至今无法复现。为何AI能击败国际象棋大师,却摆不好洗碗机中的餐具?班尼特架起神经科学与AI的桥梁,讲述大脑的进化史诗,并揭示这一历程如何塑造下一代AI革新。通过独创性框架,他将庞杂的进化史凝练为“五次突破”,每次突破都标志着人脑进化的重要跃迁,并为人类智能的核心谜题注入全新解读。(□记者 蔡可心 整理)



我与书的故事

幸福源于内心的丰盈

□ 李从尼

十七岁夏天的午后,我躲进城市角落的旧书店,指尖划过一本封面泛黄的书,梭罗的《瓦尔登湖》像一束微光,猝不及防地照亮了我的困顿。

那是一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译本,扉页上有前主人潦草的批注,纸页边缘泛着时光的褐黄,却透着一股沉静的力量。开篇“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活得有意义”,一句话便击穿了我内心的混沌。彼时的我,正被“意义”的焦虑裹挟——成绩的意义、未来的意义、他人期待的意义,却从未想过,生活的意义本可以如此纯粹。

最初读《瓦尔登湖》,我只是沉迷梭罗笔下的自然景致:初春解冻的湖面泛起细碎的涟漪,夏夜林间此起彼伏的虫鸣,深秋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寒冬里覆盖大地的皑皑白雪。那些细腻的描述,像一双温柔的手,抚平了我内心的焦躁。我仿佛跟着梭罗住进了湖畔的小木屋,看他亲手搭建房屋,开垦土地,种植豆子,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中,寻得内心的安宁。原来,人可以不被物质裹挟,不被世俗定义,活得如此自由而丰盈。

第二次通读时,我正处于大学毕业的十字路口,面对考研、就业、考公的多重选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身边的人都在追逐热门的行业、高薪的工作,仿佛只有这样才算成功。我再次翻开《瓦尔登湖》,梭罗在书中写道:“我们大多数人过着平静的绝望生活”,这句话让我猛然警醒:我所迷茫的,正是害怕陷入这种“平静的绝望”——为了迎合世俗的标准,放弃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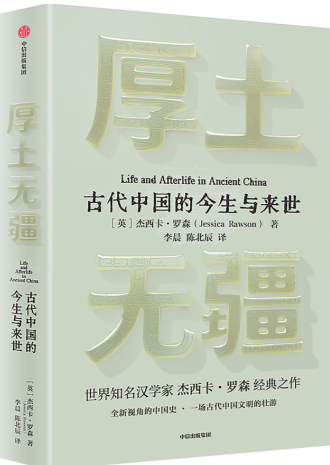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独居两年多,并非逃避现实,而是以一种清醒的姿态审视生活。他精简物质需求,让灵魂有更多空间呼吸;他远离喧嚣人群,倾听内心的声音。这本书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内心的盲从与怯懦。我开始静心思考,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而不是盲目追随他人的脚步。最终,我选择了一条自己热爱的道路,尽管前路未知,却因内心的笃定而充满勇气。

如今,这本《瓦尔登湖》依然放在我的书桌一角,纸页已被我翻得有些松散,上面布满了不同时期的批注和画线。墨香氤氲中,它陪我走过迷茫的青春,度过纠结的抉择期,教会我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起伏。每当生活陷入浮躁与焦虑,我便去翻开它,感受那份穿越百年依然鲜活智慧。它教会我,生活的本质是简单的,幸福源于内心的丰盈;不必在意外界的评价,不必被世俗的标准绑架,勇敢地追随自己的内心,才能活得有意义。往后余生,我愿带着这份从书中汲取的勇气与智慧,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瓦尔登湖,活得清醒,自由且丰盈。

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请用千字左右,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相知、相爱的故事。欢迎来稿。投稿邮箱:dazhongribawt@163.com



早期中国文明的一场壮游



□ 徐坚

这是一部讲述中国文明的关键时段,国家文明的形成历程的作品。从距今约5200年开始,延续到公元前3世纪晚期(即秦实现空前的大一统之际),这一长达数千年的阶段是中国

“五千年文明史”的第一个段落,在考古学上正是青铜时代。对于认识中国文明,这是最值得浓墨重彩、洞幽察微的段落,因为它上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山川形胜、资源物产和生计生活,下启中国文明最本质、最深邃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以及由此滥觞的书写、图绘及种种艺术、宗教和意识形态。关于这个关键时段的作品并不少见,但面面俱到,宏大而平均的叙事居多,《厚土无疆》却另辟蹊径,宛如避开主调音乐,转而采纳赋格曲一样,以跨越广袤时空距离的12处特殊埋藏为节点,循序渐进地反复深描,最终勾勒出中国的国家文明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文明的同步、独到,以及跨越欧亚大陆的文化交融。因此,《厚土无疆》提供了一场壮游的时空尺度,主题以及叙事可能性。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对三期说的旧瓶新

酒式改造奠定了《厚土无疆》的第一种基调。柴尔德提出,“城市革命”是人类社会跨文明的门槛,是青铜时代的本质,来自南北不同地点、不同时期的12个主题无一不是柴尔德城市革命的经典样本:超越一般墓葬的尺度规模,青铜、玉石、黄金甚至精致陶器等珍贵物质的奢侈调用,对来自异域的物质和技术的垄断,对他人生命的支配和占有。这些表现背后的驱动力就是稳定的社会复杂化和层级化进程。

这场壮游究竟能够带领我们抵达何处,是浮光掠影的考古新发现,还是早期中国甚至整体性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这也构成《厚土无疆》的第二种基调,即超越生死,超越个人,超越现时的墓葬观,12处特殊埋藏反复说明生死并不截然对立,墓葬也绝非一己私事。在中国文明之中,它就是现实和憧憬的投影,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舞台之一,因此成为探寻文明深处的观念和记忆的关键门径。

在中国文化中,墓葬具有格外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意义。首先,墓葬不是生死的边界。正如《厚土无疆》英文版的标题用词一样,与“生”相对的不是“死”或者“逝”,而是“来世”。其次,墓葬不必是凄凄悲恸的,它可以是充满表达和

期盼的。相对于离别和断裂,墓葬更强调聚合和连续;相对于逝者,它更多关注和表达生者的世界。

在世界所有主要早期文明中,所有的墓葬、随葬坑和器物坑都是支配社会人力和财力的指标。《厚土无疆》的12处特殊埋藏因此就是12座中心舞台。虽然如同凤翔雍城秦景公墓到秦始皇陵那样空前的尺度并不多见,但是几乎所有的陵墓都远大于同侪。而且,要么如同陶寺、随州擂鼓墩、平山三汲那样,权贵墓葬与其他人的墓葬保持间隔,要么如同殷墟花园庄东地、延庆军都山那样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所有的特殊埋藏都以令人咋舌的数量和质量为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有我优是所有权贵都熟谙的法则,无论是墓葬中的青铜器、玉器、金器,还是象牙、殉人,都是这个法则的表达形式。在奢侈性展示之外,所有的中心舞台上的角色都需要解释权力与文明的来路和走向,这造成了陶寺大墓的彩绘龙纹陶盘、鼉鼓,三星堆埋藏坑的神树、面具,双墩大墓的包金铠甲,中山王墓的铜版兆域图等,闪亮登场。(本文为《厚土无疆: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一书推荐序,刊发时有删改。)